

编者按：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乎城市形象，更关系到群众的生活质量。对于城市治理，习近平多次用到“绣花”这个比喻。他强调城市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诸多新特性，以至于传统粗放式的管理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和处理复杂而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务。特别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断衍生出繁杂的治理任务，而社会民众也不断提出更多和更高的服务要求，这些都倒逼城市治理转型。城市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形态，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

旧城作为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旧城改造是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旧城区的功能设施已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要求。旧城建设时间较早，没有健全的规划，设施陈旧，设置建设混乱，尤其是居住环境及其不好，这些都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也影响着城市的形象。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旧城区改造，把旧城区的改造工作纳入了发展规划。

随着盐城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水平的不断提升，盐城市政府也开始高度重视旧城改造工作，根据盐城市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盐城市1-8月份改造整治老旧小区完成投资超1亿元，整治项目已开工31个，竣工6个，亭湖区完成261个无人管理老旧小区街道社区托底管理，盐都区、盐南高新区基本实现老旧小区基本物业管理服务全覆盖。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完成投资9亿元，2019年度4558户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已开工3263户，竣工2517户。

本期推出“城市治理与旧城改造”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试图探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城市治理方面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问题、新诉求，提出如何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益，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对策和措施，实现城市治理专业性、科学性、精准性的统一。另外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结合地区发展规模和不同城市治理的现状，来对我国的旧城改造进行探讨，提出一些解决旧城改造问题的对策。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城市治理与旧城改造

- 02 精细化治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之路
- 04 关于中国城市治理的理论研究
- 09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旧城改造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11 城市设计在旧城改造中的运用解析

政坛经纬

- 13 理解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经济纵横

- 16 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建设超级工程？

历史深处

- 19 阅兵地点为什么选在天安门

悦读时光

- 封三 王菲版《我和我的祖国》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19年10月09日

印 数：2600-2800

精细化治理：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之路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攀升。2011 年首次突破 50%，2018 年底已经达到 60%，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很多大城市都超过 80%。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城市人，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红利，城市发展由原来的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但城市的扩张及其发展，尤其是各种“城市病”正在侵蚀着城市的健康，由此迫切需要有效的城市治理，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的水平。

城市的发展需要精细化治理

区别于分散和割裂的乡村社会，城市是各种要素高度聚集和快速流动的空间集合。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也由简单社会迈向复杂社会。城市的各个要素互联互通、紧密连接、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也带来了城市的脆弱性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任何要素、环节和部位出现“病变”或遭受破坏，都有可能导致整体性或全局性的后果，引发巨大的危机或灾难。因此城市发展越快、规模越大，有机性程度越高、连接性程度越高，其脆弱性和风险水平也就越高。

作为特殊的生态系统，城市包含了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社会子系统，其产生、发展、变异和衰亡都有复杂的运行机理。特别是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多元化、异质性、不确定性、不平衡性、不可预知性以及不可控性等都更为明显，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公共安全等，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这些问题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迫切需要细致、精确、有效、差异化和有弹性的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诸多新特性。以至于传统粗放式的管理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和处理复杂而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务。特别是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断衍生出繁杂的治理任务，而社会民众也不断提出更多和更高的服务要求，这些都倒逼城市治理转型。正是基于上述这些问题和诉求，精细化治理应运而生。精细化治理致力于提高公共治理的适应性、精准性、有效性和效益性。精细化治理成为应对现代城市治理挑战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体现理性精神和审美诉求

精细化治理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通过专业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提供精准且高效的公共服务，可及时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具体而言，在理念上，精细化治理信奉理性、专业和科学。其核心是关注细节，重视个体和局部，强调精打细算、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和追求卓越等。在过程上，精细化治理坚持多元化的立场，强调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同时其运用多元化手段，调和差异、分歧以及冲突，实现多元协同的共治。在结果上，精细化治理不仅追求运行过程的规范性和可见性，也关心结果的可测量性和可计算性。其最终通过治理过程的重塑来实现全覆盖和无缝隙管理。

对个体和局部的关注，是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原点。这既包含了对于个体或局部系统性地位的充分认可和接纳，同时也意味着高度警惕个体或局部的问题可能带来

的整体性不良后果。精细化治理强调从实际出发,关注个体和局部的需要,尊重个性和差异性,包容他者和异质性。只有深入聚焦到个人或局部,搞清楚凌乱而复杂的社会事实,才能实施细微和精准的管理。就此而言,精细化治理内在地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了对于个人及其价值的尊重。

理性是精细化治理的内核,专业和科学是理性的实现形态。专业意味着要以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充分应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科学则要求广泛利用科学技术,通过技术的力量来改进城市治理。精细化治理必须要尊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规律,重视专业人才及其知识的价值,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努力改进城市治理。特别是城市治理也要充分运用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使城市更加包容、公平和“有温度”,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城市管理应该具备精心和细致的审美倾向,从而符合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内在要求。精细化治理不仅标榜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也衍生出优美而精致的审美诉求,其中安全、秩序、整洁和美观等目标,都带有鲜明的审美气质。这意味着必须要用一套更高更严更可取的标准来引领和改进城市治理实践。就此而言,精细化治理是积极的、乐观的和向上的,体现了改革和发展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

总之,城市是特殊的,更是复杂的,传统的粗放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特性及治理需求。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良好的城市治理必须是精细化的治理,应该是理性规划的、注重细节的和精打细算的,也应该是淡定从容的以及优雅而美好的。

转变思维 追求精细化

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精细化治理的热潮,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西安、大连、湖州、大庆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了精细化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精细化治理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城市治理的所有重要领域。

城市要实现精细化治理,就必须转变思维。首先,治理主体要深入培育专业的思维、科学的意识和认真的态度,形塑精细化治理的文化精神。其次,城市治理要统筹协调展开顶层设计,推进各个层面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提高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再次,精细化治理需要充分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事实进行科学的分类和编码,提供精细化治理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最后,治理主体需要广泛应用民意调查和协商

对话等治理技术,提高公共服务的差异性、个性化和民主性,提高社会民众的满意度。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精细化治理究竟精细到什么地步,如何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的目标。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挑战以及悖论。社会事实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的管理单元具有无限可分的性质,因此究竟锁定和聚焦到什么层面的细节,往往存在争议和挑战。尤其是注重细节、从小处着眼、重视个人和局部,很有可能会导致对个别事实的迷恋,而被局部的情况蒙住了眼睛,忽略了城市治理的战略方向和长远目标。

精细化治理是与科学技术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发展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资源。但精细化治理的特点应该是精打细算、计较成本、追求效益。因此,精细化治理绝不能简单等同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这就要求考虑到资源投入是否值得,有没有意义。否则以精细化治理的名义进行过度的资源投入,就会导致严重的浪费和低效。

面对高度细分的社会单元行使权力,精细化治理往往需要更多的人性化和柔性化以及灵活性,从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治理策略以及方法,提供细微而周到的服务。与此同时,城市治理也越来越强调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求给予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公平的待遇,防止权力的滥用。但是,人性化的服务诉求与执行中遵循的普遍性规则就构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性,经常导致执行者处于两难境地,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社会事实充满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社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是高度模糊的。城市治理绝不是实验室里的操作,不能用“化学试剂”来获得答案。精细化治理不是简单追求工作的加量加码,如加快工作节奏、拓宽工作范围、提高工作额度、增加考核指标;更不应该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强求一致,损害城市的多样性及活力。所以,精细化的治理不仅是量的提升,更应该是质的优化,应该给渐进性试错留下空间。

城市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形态,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当今和未来的城市治理必然是专业性、科学性、精准性的统一,同时关注细节、注重效益以及精益求精。在此基础上,必须对各个城市要素都给予充分而适度的关切,以防止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进而全面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益。

(2019-07-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关于中国 城市治理的理论研究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在新时代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解决“城市病”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理论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其理论内涵、时代意义与实践要求，以及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研究都有涉及且在持续深入。但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治理理论应突破瓶颈，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特点，从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出发，形成城市治理新的理论体系。同时，完善多元主体间的协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道路。

2015年，中央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这是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政策体系中，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但是城市治理到底是什么？怎样去治理城市？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如果不能捋清这些问题，那么城市治理将会走“歪路”或者流于“口号化”。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方兴未艾，截止2019年1月15日，在中国知网（CNKI）的CSSCI来源期刊中以“城市治理”为主题的各类文献有1547篇，以其为篇名的则有223篇。本文拟从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理论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其理论内涵、时代意义与实践要求，以及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以期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研究的深入。



一、我国城市治理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一）城市治理产生的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格局多元化，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社会稳定风险加剧，一些社会问题诸如拆迁、社会保障、流动人口等，还有一些城市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如发生在厦门、宁波、成都等地的PX项目事件）。随着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城市治理及其理论正是用来解决和证明“城市”和“治理”二者融合所形成的各种现象。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城市治理产生的背景。

1. 城市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提高了1.0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8.3137亿，而197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7245亿，城镇化率低至17.92%。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18年约为43.4%，两者同期相差16.18%，也就是说有近2.26亿流动人口常住在城市，但是却享受不到相应的户籍市民待遇。周

少来曾指出，随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转型为城市文明社会，但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将给传统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制度性的冲击和挑战。曹海军认为，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化的问题层出不穷使得城市管理任重道远，传统的城市管理之道面临挑战。

2. 城市病。城市病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和谐，我国多数城市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病”，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将会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拖后腿”。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谈到：“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大城市中去，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不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正当工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出现了住房短缺。”曹海军指出：“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暴露了城市管理的弊端，无法应对诸如增长、移民、反恐、贫困等‘城市病’，为创新管理体制提供了机会和挑战。”而姚尚建通过对城市问题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城市的问题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关键，具体表现为“城市病”和城市治理的交织。和曹海军观点相似，刘淑妍、朱德米等人也认为落后的城市管理方式无法应对这一系列“城市病”，希望通过城市管理的转型来充分调动和利用有限资源来消除这些瓶颈，使城市能够良性运行和发展。

3. 治理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俞可平以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与服务、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的治理改革为例，认为城市治理既要注重实践经验，也要将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将一些比较好的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从制度上解决城市治理的动力问题。李永海通过对北京疏解提升工作的治理实践中发现城市治理要从社会历史进程和城市多维复杂性中去梳理，要从区域协调中去思考，更要从基层社会组织中汲取力量。而韩福国基于杭州城市治理的观察，认为协商民主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方式，实现政府领导与社会多元参与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资源嵌入到发展中去，实现城市治理的可持续性。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病”问题的涌现，一些城市已经逐步探索治理措施，学界正是基于这样的大环境下去研究城市治理理论，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热点。有学者去研究西方城市治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也有学者去研究抽象化的城市治理体系，还有的学者聚焦某个城市或城市群治理实践等，这也导致了学界对城市治理的研究多而散，多单一性而缺系统性。

（二）城市治理的理论基础

城市治理是一个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价值理念与治理技术两者相互融合与共生演化，共同作用于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城市治理理论作为城市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城市治理又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认为我国城市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为以下四个：

1. 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和城市治理相关的理论或文章，但在其著作中也有些关于城市和社会治理的论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城市治理的原则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罗志刚指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作为一个真命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审视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的问题，重塑价值取向，使社会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梁宇认为，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个体以联合的形式占有社会财富，共同体整合所有个体的智能和体能以加速社会发展；同时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要考虑社会资源的分配均衡，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革，人人平等参与公共生活、实现自主管理。

2.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指出，国家、集体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建设美好城市。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曾两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以明确对城市的基本认识，加强对城市的集中管理和解决城市经济生活困难问题。江宇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等人探索的基础上，对治理国家和城市进行了探索，从他年轻时候的“无政府状态”转变为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真正的联合，通过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走群众路线来治理国家和城市等思想。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举世瞩目的增长速度让许多人忽视了城市治理的合理性问题，但是中央对于城市治理问题并没有忽视。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认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时期，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4. 西方城市治理理论。西方城市治理理论的研究比我们稍早,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学派都对其进行了研究,期间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曹海军指出,西方城市治理理论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分别是主张“大都市政府”的传统区域主义、“政治碎化”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复合性网络”的新区域主义。计永超则整理了西方学者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认为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治理结构(主要是治理主体间权责配置及关系)、治理模式转型研究、社区治理、区域治理和治理评价等六个方面。西方城市治理的经验及其理论,对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对象,学界通过研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借西致中”,以期为中国城市治理提供意见与建议。

(三) 我国城市治理的发展脉络

1. 中国城市治理的制度变迁。城市治理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如何促进跨区域治理或推动协作治理,寻找一种合适的治理模式。“运动式治理”是我国重要的城市治理方式,即通过有效的宣传,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完成某些治理任务,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事后如何维持治理效果。牟春雪、张存达等人在国家、科层组织、社会三重逻辑下,从城市基层治理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制度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的演化,认为要理性把握中国城市治理的演变逻辑,抓住发挥关键作用的治理主体,更好地促进城市治理的变革与创新。

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是我国城市体制变化的一条主线,总得来说,学术界针对中国城市治理的制度变迁的内容并不多,没有什么争议,只是研究角度不同,较多地集中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

2. 中国城市治理的理论发展。在1998年以前,我国学界研究城市治理集中在环境和交通治理等领域,很少有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涉及于此。从1998年算起,一些社科领域的学者开始接触并研究城市治理。目前国内城市治理议题多集中于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区域经济和地理等学科领域,而在政治学、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近几年则方兴未艾。一些学者引入新区域主义和城市治理相关理论,使得我国的城市治理理论愈加自觉和系统化。另外,国内学界主要集中于城市治理的兴起背景、基本含义、治理模式研究、分析框架、治理实践、

效果评估、反思思考等内容的研究。

从“城市管理”转向“城市治理”,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跨越,还是传统管理型城市向现代治理型城市的转变。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改变城市发展思路,国内学界有关城市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前景仍十分广阔,有关多中心治理中的政府、非营利法人、营利法人与公民良性协作治理,中国特色城市治理道路等问题尚缺少深入的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二、城市治理的理论内涵

关于城市治理的理论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笔者主要从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 治理主体

在20世纪,“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之争甚嚣尘上。现在,多中心城市治理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并进行研究,但是关于治理主体的细分上则有所不同,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1. 三主体说。刘卓认为我国城市治理的理念在于强调参与式的“多中心”治理,重构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市民三者的关系,三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刘淑妍和朱德米则认为,参与式城市治理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相互合作和互动的关系,强调了利益相关者卷入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的城市管理过程。

2. 四主体说。顾朝林曾指出:城市治理正面临结构性的转变,政府需要更多地成为协调者,调动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共同协同工作。计永超认为,要重塑政府、社会、市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从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市场本位转变。而李宪奇则构建了以政府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 and 私人部门为主体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模型。

(二) 治理客体

1. 城市社区治理。张艳国和刘小钧等人总结了我国社区治理新常态:建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和谐、社区治理法治化、体现社区新特色等。赵孟营基于关系论的视角,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治理主体间关系如何实现现代化,用以功能链接为轴心的“扎根式”代替目前的以公共权力为轴心的“葵花式”关系格局,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金太军则聚焦城市边缘社区(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社区),提出应以“多中心”治理体制的全面建构,解决边缘社区治理体制落后、转型阻力复杂的问题。

2. 邻避冲突(Not in my backyard)。目前,中国城市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闫帅认为这是一种“空间正义”与“居住正义”问题,认为民众存在的“不要在我家后院,

但也不要离我太远”转型心理，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应该注意这种“转型心理”，才能减少邻避冲突。孙小逸从城市治理理论出发，认为在城市治理框架中考察邻避冲突，有助于地方政府采取制度性回应策略，缩小抗议居民与城市政府之间的目标差距，解决邻避冲突。王佃利等人则从公共价值失灵角度来分析邻避问题，提出通过吸纳多元主体偏好、运用补偿和制度机制、加强监管等措施，重构公共价值。

3. 城市区域治理。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四大国家区域战略，体现了中央对城市区域发展的重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刘西忠提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横向协作、促进协同行动、强化契约意识、倡导合作共治来建立完善由多元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唐亚林认为：要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政策体系一体化、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制度一体化”进行优化，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的政策整合力度，形成城市区域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三、城市治理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要求

（一）城市治理的时代意义

1. 对人的意义。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和其它要素向城市汇聚，而城市治理的“牛鼻子”就是“人的城市化”，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美好。韩震指出，城市治理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更好地更幸福地生活，让市民都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新市民早日融入城市生活，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城市。韦如梅认为，目前公民参与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形式主义严重等问题通过城市治理来解决，可以培养现代公民素质，建设现代公民社会。

2. 对城市发展的意义。赵宇峰指出，通过城市治理，提高城市各主体的交往与沟通水平，提升城市的多元合作，让城市真正成为人们安居乐业、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生活共同体。钟晓华则通过对国内外城市治理案例的分析，认为治理可以提升城市空间的承载能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和竞

（二）城市治理的实践要求

1. 目标要求。建设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目标。杨宏山指出，城市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市民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需求。

2. 理念导向。以往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城市的理念已经落伍，构建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和培育现代城市治理

能力迫在眉睫。叶林、宋星洲和邓利芳等人指出，城市治理转型在分权式治理的框架下，需要体现整体性、参与式和智慧型治理，必须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用新的办法思路应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

3. 具体举措。秦国伟和董玮指出，通过强化科学和约束性的前段规划、提升现代建筑能力、加强宜居城市功能、构建智慧便捷法治的治理机制。王浦劬和雷雨若认为，以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开辟城市治理现代化路径、科技创新推进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新推动软实力建设来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

四、综述与展望

（一）对城市治理理论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学界从产生及发展历程、理论内涵、时代意义、实践要求、研究方向等方面对中国城市治理做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如何将理论系统化、实践化，明确这些不足，对深化城市治理研究和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大有裨益。

1. 从研究内容看，学者们在理论上做了针对性的探究。在现实背景层面，有学者关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城市病”，也有学者对某些城市的治理经验进行总结，形成自己的见解。在理论渊源层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一些学者对西方城市治理理论进行了解与学习，并引入到国内成为理论基础之一。在理论内涵层面，学界对治理主体的研究比较多，有的学者认同三主体说，也有的学者坚持四主体说，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城市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而关于治理客体的研究则比较繁杂，基层治理、区域治理、邻避冲突等方面均有学者研究，尤其是社区治理。在时代意义层面，学者们不仅指出对治理主体本身的意义，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阐明了城市发展本身的现实意义。在实践要求层面，学者们从目标要求、理念导向和具体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是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综合体工程，“罗马非一日建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治理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也将进一步扩大，使其规范化系统化的难度增加。

2. 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注重运用描述性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描述性研究法的运用，提出问题，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将城市治理理论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但是描述往往偏于局限，内涵和外延还需进一步厘清。个案研究法的运用，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一些城市的治理措施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

成过程，但是研究较多地关注大都市，而忽视了对数量更多的小城市的研究。比较研究法的运用，国内学者将中西方城市治理实践与理论进行比较，借鉴经验以期推动发展。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城市政治理论的复杂性，应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能将相关研究继续深化。

3. 从研究视角看，目前学者主要三个维度去研究。空间维度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去研究城市治理，形成空间对比；横向维度是如何使城市治理的研究全面化，使得城市治理理论涵盖更多的内容；纵向维度是怎样推进城市治理纵深发展。要推动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需处理好不同视角之间的逻辑关系，用多元思维去理解城市治理。

（二）对中国城市治理的展望

现代城市治理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社会参与机制和渠道不畅、缺乏专业机构、政府管理理念与能力有待提高等原因导致我国城市治理还未体系化，治理能力偏低，仍处在城市治理转型的阵痛期。目前我国城市的治理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要实现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学界对于“城市治理”理论的研究也会持续深入，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研究。

1. 理论层面：理论系统化与多元化。城市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研究城市治理的理论也应进行系统化。其一，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未来将持续增长，亟待突破一些瓶颈，需要的是理论创新发展，将现有的城市治理理论进行归类、整理或加工，使其集中起来作有系统的排列。其二，推动跨学科交流，先前的城市治理研究较多集中于学者本学科领域，比如说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可以从城市政治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视角去分析和理解城市治理问题，当然这也要求学者去多关注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拓展多元思维。其三，研究主题贴近实践，将研究重点与中国城市治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更接地气和更具实用价值。城市治理理论应克服困难，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特点，从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出发，形成城市治理新的理论体系。

从多元维度对城市治理新体系进行完善。政治维度，学界可以从增强政民互动，拓宽和完善民意反映渠道，各级人大代表也应深入社区了解居民的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地了解、反映和解决问题等角度出发。经济维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相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学界也要实现理论现代化。社会维度，研究城市治理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形成个人自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建设和谐友善安定有序的城市社会。生态维度，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只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需要我们多从美丽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相适应的角度出发。国际化维度，不仅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理论，而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诸如印度孟买的城市治理理论和实践，我们也要抱有虚心学习的心态，汲取经验教训，助力中国城市治理。

2. 实践层面：中国特色城市治理道路。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虽然理论层面达成了共识，但是实践中仍存在少部分的“官本位”思想，认为权力就是最好的治理手段，这样容易造成政府和其他主体间的脱节，亟待规范行政权力，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其次，鼓励支持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现有的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志愿者组织，面临着经费不足、人员流动大、体制障碍、缺乏规范化等难题，需要在立法上进行规范和司法保障、行政和社会提供支持保障，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常规化。第三，积极推动市民参与。推动城市治理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也更有利于推动治理措施的实行。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第四，数字城市治理新方式。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与功能整合，建设政府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综合性城市治理数据库，发展便民利民惠民智慧服务应用，让城市治理更具智慧。

（2019年4期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 旧城改造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旧城区改造，把旧城区的改造工作纳入了发展规划。我国的旧城区改造是随着我国的建设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建设一直都有，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建设模式，所以很多城市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旧城区的改造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造是为了更好地增加城市的功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的形象得到提升。旧城改造的过程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市的翻新，建设过程是一个政府、消费者和开发商等多方利益平衡的过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调整城市的功能区划，保证城市功能更加完善，更加美观，因此旧城区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复杂性不言而喻，为此文章探讨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旧城区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解决，希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初期，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城市化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和中心问题。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聚集地，也是发展的中心区域，城市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

化进程的快慢也是决定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旧城区的功能设施已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要求。旧城建设时间较早，没有健全的规划，设施陈旧，设置建设混乱，尤其是居住环境及其不好，这些都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也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因此必须对旧城区进行有计划地改造。

旧城区作为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旧城区的改造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通过旧城区的改造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提升城市整体的功能区划，加快城市总体建设，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阶段，对旧城区的改造是检验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标杆，只有解决了旧城区改造这一重大课题，才能更好地提升社会满意度，增加居民的幸福指数。

但是目前在我国的旧城区改造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建设过程中重视城市用地，忽视了城市环境的总体规划，旧城区的改造不是简单的建设，而是针对城市人口多、土地紧张等问题的建设过程，但是过度的重视土地利用，没有绿化规划建设，严重的影响了新城区的环境。其次是没有将城市的修复和保护提上建设日程，如果只是一味的建设城市，而没有考虑到一部分城市经过适当的修饰可以更好地满足需要，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第三是旧城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没有将自己的特点突出，造成了建设的各个新城都是一样的特点，影响城市美感，最后是资金与利益的矛盾较突出。

二、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的重要性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标志，现代的城市发展包括两个主要的标志，一个是城市旧城区的改造，提升城市美感，一个是对城市边缘区的建设，对城市边缘区旧城结构的重组，这两方面构成了现代人所需要的新都市，新都市提倡重新组织公共政策和开发实践，主张恢复现有的中心城镇和位于城镇连绵区域内的城镇，提

倡多样化、人性化的邻里，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文化遗产。这就说明城市再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制定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政策，并不断地实施管理，是旧城区改造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旧城改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首先是拆迁补偿问题，旧城改造顾名思义是下旧城上建设新城，这就需要承担旧城拆迁的成本与人员的安置费用，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大部分费用都是由政府来负担进行的，拆迁产生的费用也是有政府来之处，旧城区由于居住人口较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经费的灵活性，在补偿的过程中无非两种模式，一个是房屋的置换，另一个是经济的补偿，这需要与房屋所有者进行协商，而拆迁的位置往往处于发展的中心位置，这就增加了补偿的费用，也增加了拆迁的难度。

其次大规模的城市拆除，影响人文设施的保护，我国城市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历史沉淀而来的，所以存在大量的人文古迹，旧城区的改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建筑的保护，虽然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一些便利，但是我们的建设也使历史在这一刻消融了，这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建设新城需要更多的规划提升新的东西，一方面是要更多的保护旧的建筑，这对建设者来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第三是新城区对城市景观建设的盲目追求，在当前中国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大潮中，伴随着城市的大规模发展，“千城一面”现象日渐明显。城市规划的过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的领导大部分专业知识不是特别的丰富，对城市的总体规划考虑上尚有欠缺，也没有进行专家探讨的意识，所以就导致城市建设更多的是注重城市发展的利益，而忽视了城市发展与景观建设，景观建设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林的高楼不但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难题——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和人口稠密等等，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是这些楼宇中几乎有过半在艺术风格上是不能容忍的而又无法再兴拆建。

最后是盲目改造造成浪费，今年我国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是拆除一个新城来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这种只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还会影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大的建设面积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些问题说明我国的旧城改造过程中还存在这些难以解决，不好权衡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

的旧城改造工作。

四、旧城区改造对策研究

旧城区改造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永恒课题，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发展的过程必须有科学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指导，不然就会影响经济发展，我国的旧城区改造必须走节约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突出各个地区的城市发展特点和民族特色，形成自己的城市建筑特色，才能更好地完成旧城区改造的任务。

首先制定科学的规划，将政府在旧城改造中的作用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提升政府公信力，政府主导核心是解决科学规划和筹集资金的两大问题，完成好这两个主要问题可以更好地为旧城改造服务。其次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文物，我国的旧城是新中国发展的缩影，有很多值得我们保护和利用的东西，不是简单的拆除建设新城就可以的，我们在建设新城的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对历史的尊重。第三是提高城市自主特点，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旧城区的改造不能是单一的模仿，建设的城市全国都是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特色，影响了城市的总体美感，为了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在建设过程中管理者更多的应该将城市人文特设考虑到建设中，形成独特的新城。最后是量力而为的进行城市建设，城市建设不是盲目的进行扩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民生工程还有很多，盲目的将经济都投入到旧城改造中来，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序性，为了更好地发展地方经济，旧城改造是一个长久的问题，需要慢慢的进行摸索和实践，最终达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共同进步的目的。

五、结论

旧城改造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的小缩影，只有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才能更好地发展城市经济，城市改造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性。旧城的改造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及其积极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但是旧城区的改造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旧城区改造的规模和形式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地区发展的规模不同，改造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本文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来对我国的旧城改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解决旧城改造问题的对策，希望可以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2018年27期 中国市场)

城市设计在旧城改造中的运用解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旧城改造工程项目也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如何保证城市建筑质量、改善城市环境是各相关施工单位必须重点考虑和研究的任务之一。相对，这就使得城市设计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本文也会对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工作的原则以及运用要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便相关人士参考借鉴。

对于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保证旧城改造工程的顺利开展，做好城市设计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旧城改造与城市设计可以大大改善城市空间环境和自然环境，并且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以及规避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问题等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将城市设计思想有效融入到旧城改造工程中，是一件十分可行的事情。



一、城市设计的意义分析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城市建设，相对，对于城市设计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它是城市规划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空间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

改善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实际运行时，城市设计的工作内容十分宽泛，其既要注重城市空间环境质量以及建筑质量，又要与城市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保证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而以优美的形象以及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吸引更多的人来进行投资、购物和工作，将地区经济建设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此外，城市设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加快城市发展速度，使其与原有的部分结构可以充分的融合，进而在增强城市环境质量的基础上，全面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建筑遗产，使城市物质层面可以较以往有着进一步的提升，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都市。

二、城市设计的要求分析

一直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内容，但是在实际改造过程中，却要面临很多困境问题，具体主要体现在旧城原有物质设施水平低下、旧城功能过于集中、旧城人口众多、旧城用地资源紧张以及旧城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给旧城功能以及整体结构的优化带来很大的难度，而且也给城市的二次发展造成很大阻碍，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强化城市设计工作，提升城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并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使其形成一个完美统一的整体，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目的。

三、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原则分析

(1) 积极探索旧城空间布局规律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其整体形象和面貌的维护不仅要保证城市建筑质量上入手，还要全面丰富整个城市空间场所，因为城市空间场所是市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只有达到一定的和谐性和环保性，才能提高人们的关注度。因此，在进行旧城改造施工时，城市设计人员必须对旧城空间布局规律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并严格按照一系列可行性强的设计原则来进行，如：有

序性原则、侧面封闭原则、边沿连续原则、综合性跨接原则以及室内外融合等原则，这样才能保证空间场所结构的清晰性，使其可以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以及风土人情等。此外，城市设计人员还要掌握现代化的设计理论，如：图底理论、联系理论、场所理论等，进以充分验证各种设计技术以及施工组织技术的先进性和有效性，从而在旧城改造中发挥出相应的实效作用，将整个城市空间场所质量提升到最高标准。

(2) 充分发掘旧城文化底蕴

从本质上看，城市文化特色与城市空间形态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其中，城市文化特色是设计人员利用相应的艺术手段将城市空间场所、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进行适当的修饰和完善，使其较以往更加丰富化、深入化，进以有效吸引人们目光，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旧城改造施工过程中，城市设计人员应充分发掘旧城文化底蕴，对城市各种场所特征进行相应的总结和优化，使其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使用需求。同时，还要尊重历史文化，秉着人性化设计理念来增强社区层次功能，使其整个区域环境能够达到一定的舒适性、愉悦性和观赏性，这样才能推动城市化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大力激发旧城生命活力

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城市设计人员一定要将地段复兴作为核心目标。即采用相应的设计技术和施工技术对原有的城市形象进行重新的塑造，进以实现城市风貌的有效整合，激发旧城生命活力，使城市整体面貌和功能都可以满足各行各业的发展需求，从而最大化维护社会经济体制的平衡。

四、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的相关控制要点

(1) 注重城市设计的延续性

要想做好旧城改造城市设计工作，首要任务就是要注重城市设计的延续性，集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管理体系，如：城市建设管理部门、

规划部门、建筑单位以及市民等，这样才能保证城市设计质量，为旧城改造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城市设计要从全局角度出发，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划分，使之各个组成部分都能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并且还要与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建设做到同步发展，这样才能吸引人们的投资、购物和工作，从而最大化带动区域经济建设。

(2) 注重城市设计引导与控制功能的有效发挥

众所周知，旧城改造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所以在进行城市设计工作时，也要遵循旧城改造的本质，将其所具有的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最大化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为城市具体项目建设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在实际运行时，相关设计人员要制定一个适应范围较广的控制性规划方案，进以保证土地使用性质以及土地开发强度都能处在可控范围内，其中，土地开发强度是指土地面积、建筑高度、绿地面积等指标参数，其只有与国家相应的标准要求相吻合，才能确保城市建设的环境效果。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城市设计工作的正确引导和控制，这样才能设计出一个突显当地景观特色的现代化都市。此外，城市设计人员还要充分考虑公众环境以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提升，从全局角度出发，制定一个完善的总引导和控制设计方案，并将其贯彻到每一旧城改造环节中，这样才能保证城市空间环境质量和自然环境质量，从根本上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五、结语

在旧城改造中，做好城市设计工作十分重要，相关工作人员不仅要掌握好城市设计原则以及相应的控制要点，而且还要对城市设计的本质以及要求进行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针对性的制定出完善的设计方案，进以在保证城市空间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最大化推动城市经济建设。

(2018年35期 科学与财富)



理解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从文明传承还是民族复兴的视角，都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影像中看出中国的“国家独特性”。为何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中国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屹立不倒？因为与同时代很多有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不同，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都在致力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中国“国家独特性”最为显性的特征，也是理解当下中国、思考未来中国的逻辑基点。

独特的背景

“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西在其《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开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难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独特”之源。哈尔西通过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放在世界历史语境下，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为何能屹立不倒，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但在探讨中国如何较为成功地构建现代国家前，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被动地卷入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前，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与后来有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相比有何独特之处？我们不妨从最直观的历史事实入手，即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疆域大体保持完整，中央政权从未完全失去对疆域的控制。相比之下，在领土和人口上曾一度与清朝中国接近的奥斯曼帝国，最终“萎缩”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土耳其），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则彻底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大一统”思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无需赘言，但在清朝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体现在清朝政府对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在内的边疆的实际控制力，但更为关键的是，就治理手段来说清朝政府已经带有某些“现代”特征。相比于明朝，清朝对边疆的控制，带有更明显的事实管辖特征。比如，清朝在击败准噶尔势

力后即在拉萨驻有常备军，并设立噶伦与西藏地方精英共同处理地方政务，后来又设立了常驻拉萨的驻藏大臣。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清朝政府对边疆的军事控制，主要考虑是为了稳定作为统治核心的内地。也就是说，把稳定边疆作为统治内地的外围屏障。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军事存在”至今仍是一国中央政府彰显事实管辖的重要手段。清朝政府在边疆的军事存在，与旧式、传统的帝国以及欧洲殖民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政治意义上已带有现代特征。

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中，以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旧式帝国为例，详述了对外扩张与帝国存在之间的密切联系。简单地说，这些帝国的扩张与财富掠夺直接相关，一旦停止扩张，帝国存续危机就接踵而至。而清朝则完全不一样，它对边疆的控制与财富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与带有现代性的主权管辖更为接近。

另一个差异是治理手段。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其对外扩张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清朝政府重视宗教在稳定西藏、蒙古、新疆中的作用，但它也一直在政策上防止宗教权力化，底线是不能使宗教影响转化为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朝乾隆年间在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对“伯克”（地方首领）制度进行改革，废除其世袭制，并禁止阿訇介入行政性事务管理。在官僚体制上，这种做法已经在向更具现代特征的“非人格化”靠拢。

政治原则上实行政教分离，权力运作上推行世俗化，这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不一样，更带有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特征。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个不同点：中国历史上在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权力运作的世俗化方面，远比历史上那些欧亚帝国要成功和有效。当然，清朝统治者不可能具备主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意识，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无意识”的。但在当时清朝中国独特的内外环境因素作用下，客观上促成了其不同于旧式帝国的特征。

18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突破2亿。这样的超大型人口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意味着，即便清政府维持极低的税率，也能产生庞大的、足以确保国家正常运转的财政收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现实，事实上形成了人口高度同质化的局面。这一方面为内部分歧、矛盾乃至动荡的低频率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延续、塑造身份“认同”。

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中原为腹地的文明核心地带，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向心力已反复被证明，这种影响在清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即便在与沙俄和清朝都对峙、战争时，准噶尔依然能清晰地将两者区别开来。他曾致信康熙，“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

但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历史中，国家“认同”可以说从未真正产生过。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地方精英，他们对“认同”的感知，从未超越过对利益的盘算。如果把19世纪中期视为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起点，那么在这个转型开启之前，清朝中国已带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皇权统治，依然是传统、旧式的。但另一方面，清朝中国的治理手段和国家形态，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特征。

独特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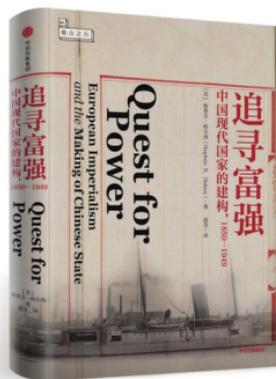
与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也是被动的。但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一味地陷入被动，而是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寻找主动。在民族国家转型方面，学术界较为主流的概念是“财政-军事国家”。其基本逻辑是，军事开支的攀升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从而倒逼财政体系的改革，进而引发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权力结构的变化，最终导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个逻辑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很有解释力。1490年欧洲独立的政治实体数量约为200个，但到1890年降为30个。这段历史正值欧洲战乱频仍时期，也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基本吻合。有屹立不倒，也有轰然倒塌。非西方世界亦然，只不过更多地是以被殖民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客观地说，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某些非西方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不是没有进行过抗争或救亡图存式改革，有些也尝试过打造“财政-军事国家”，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存在某些相似性。用哈尔西的话说，那就是“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国家）与千疮百孔的经济”。他在讲述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时写道，“欧洲人遇到的不是强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是继这些帝国后出现的一系

列地方性国家。”

同样是遭遇外部冲击，中国历史的演进路径完全不一样。在某些学者看来，中国迈入现代国家门槛遵循的依然是“财政-军事国家”逻辑。经济上的土崩瓦解与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是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晚期的共同特征。这两个特征，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中国历史中并不明显。内忧外患造成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经济实力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抽取能力，不足以转化为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晚清的中国在应对方式和成效上与上述非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

据斯蒂芬·哈尔西的研究，去除通胀因素，清朝政府的税收收入，从1842年的白银4200万两，增加到1911年的1.2亿两，总共翻了3倍。虽然清廷在趋势上行将就木，但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危机下中国的国家建构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在应对内外危机的过程中，清朝政府不是在正常的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叠加”一个包税人制度（莫卧儿王朝印度的做法），而是依托已有的官僚体系实施财政体制改革（比如推行带有地方税特征的厘金制度），从而“内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19世纪50年代前，田赋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占七成以上，但到19世纪末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0%以下，新兴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税收比例大幅上升到60%以上。这样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接近19世纪初的英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强军，后来延伸到近代工业、教育乃至治理体系（比如建立警察制度）。这种政府层面的现代国家建构的成功，离不开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即强大的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哈尔西写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个工厂，到18世纪中期，它的贸易已经开始改变孟加拉已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就是说，欧洲殖民帝国

在印度建一个工厂，就能轻易地将其政治经济模式复制一次。但这种情况在晚清的中国从未发生过。经济上的韧性、与政治上的韧性相辅相成。政治上的韧性，得益于清朝政府在权力的集中与下放问题上的务实（或者说被迫）调整。清朝早期的权臣是多尔衮、鳌拜、索尔图、索尼等，但晚清活跃在权力场的却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汉官。

从满族统治精英的角度看，这是与汉人“分权”的问题。但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权力体系“开放”的问题。也就是说，出于应对王朝危机的需要，晚清政府的分权客观上导致了权力体系的开放。而权力体系的开放性，是衡量现代国家建构的指标之一。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中国政治上解体。晚清汉族权臣，尤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没有取清廷而代之，不能不说是一种“愚忠”。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国家意识”的一面。

在某些学者看来，国家意识的萌发和提升，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政治上大一统和疆域上大体完整的重要原因。清帝退位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各路军阀完全掌握地方的财政、行政和军事大权，但中国并没有分裂为多个独立国家。

独特的国家

清朝轰然倒塌时，带有现代国家特征的中国已经形成，虽然孱弱但极具韧性。这种特征是当时其他非西方大国所不具备的。《清帝逊位诏书》宣称总期“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有学者认为，这份诏书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大一统中国”理念的政治合法性。

如果说源于《清帝逊位诏书》的政治合法性只是“表”，那么当时中国政治精英和实权人物的“国家意识”可谓“里”。“表里合一”共同构成了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韧性。比如，掌握新疆军政大权近 20 年的汉官杨增新，把新疆经营成了俨然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实体，但同时他也一直捍卫中国对新疆的主权，从未有过脱离中央政府宣布独立的打算。

事实上，在军阀割据混战的高潮期，“独立建国”不仅不是选项，而且是政治禁忌。虽然各路军阀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但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却依赖于“国家统一”。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一方面中国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却还在继续。

在某些学者看来，军阀混战有导致中国民不聊生的一面，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竞争性政治”，谁能在现代国家建构上走在前列，谁就更可能实现国家政治上

的统一。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在路径上与当时的非西方国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主要剧情变成了关于打造“财政-军事国家”的竞争。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李怀印教授看来，中国的路径更像某些欧洲国家。不过他也认为，与欧洲的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先行者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像后来者德国、意大利那样的自下而上，“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统一国家和建立全国政府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李怀印也指出，即便与德国、意大利相比，中国的路径也有着诸多不同，而且走得也艰辛得多。一方面，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外部地缘政治环境险恶，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区域政权要想在竞争中取胜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不像德国、意大利，在从事领土扩张和国家统一前，便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地方政权，民国初期的地方政权，总体上还停留在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而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开始的对华入侵，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国家建设步伐。

但日本侵华并没有完全阻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根据某些学者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联合抗日的同时，也在进行国家建构的竞争。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写道，“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学者发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是其在西北贫困地区所展开的大胆、灵活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重点是发动群众、合作生产、自力更生和纯洁党的队伍，亦即‘延安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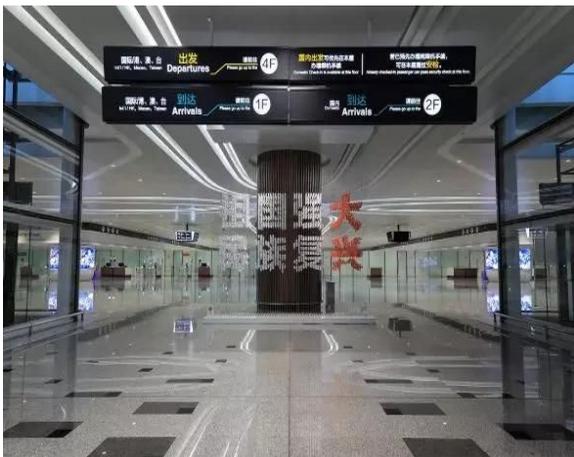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原因有很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关键的原因之一是这支政治力量在现代国家建构上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当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偏安广东一隅的军阀派系时，宋子文启动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为其挥师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财政改革乃至现代国家建构囿于种种原因停滞不前。这种状况后来演变成体制性腐败，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丧失了政治合法性。

回顾 19 世纪 50 年代至 1949 年的中国百年历史，不难得出为何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同样也可以得出中国何以“独特”的结论。清朝政府在政权危机之下的应对之策，发展成中国政治精英的救亡图存，进而演变成现代国家的建构。这个独特路径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在国家转型上，会造就不同于当时非西方大国和帝国四分五裂或沦为西方殖民地的结果。而在转型路径上与西方的诸多差异，又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在“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

（2019 年 19 期 南风窗）

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建设超级工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9月25日，被外媒评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超级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世界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全球首座双层出发、双层到达的航站楼，世界首个实现高铁下穿的航站楼，世界最大单体航站楼……创下众多“世界之最”的这一超级工程，令国人自豪，令世界震撼！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强调：“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顺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落后的交通环境，到通行里程均居世界第一的中国高速铁路、中国高速公路，“中国路”飞速发展。从南京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中国桥”

成为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名片”。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再到“嫦娥”奔月，国人千百年来“可上九天揽月”的飞天梦想得以实现。从“蛟龙”号到国产航母试水，助力中国走向大洋、探索深海，“可下五洋捉鳖”不再是神话。不胜枚举的“超级工程”无一不是中国的时代符号。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能建设这么多的超级工程，中国为什么？为什么是中国？

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好多事情是国外办不成的”超级工程，是指在体量、技术精度、作业难度等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的工程项目，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科技基础极为薄弱。正是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有限财力，确保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青藏公路等一大批超级工程得以实施。

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之上第一座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以及采用国产材料施工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大桥修建之前，因长江两岸无法贯通，过江客货都要乘船摆渡，严重影响了运输效率和人民生活。

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耗资2.87亿元，而当时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400多亿元；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新一代中国桥梁专家；从全国各地选招7000多名建桥工人，最多时超过万人，在南北两岸同时开工。“当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我国经济基础很薄弱，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克服了缺资金、缺物资、缺技术的诸多困难，全力确保了这一重大工程的建设。”当年参加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工程师龙其普回忆。40多年后，修建南京长江三桥的项目总投资为30亿元左右，但当时全国GDP总量已达12万亿元左右。当年国家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所集中的财力、人力可想而

知。

而这座历时8年修建而成的“争气桥”，不仅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也成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国家的很多重大工程，之所以能干成，是因为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主任设计师蒋清富在接受采访时说，“好多事情是国外办不成的，他们很多思路比较好，但是力量比较分散，比较薄弱。”全国一盘棋、高效执行、有力推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又一个体现。南水北调工程，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涉及面积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水调工程。工程占地涉及7省市100多个县，为保证这个世界级超大工程顺利开工建设，38万人实施搬迁，50多万人进行生产安置。仅河南、湖北两省丹江口库区就搬迁33万人，其中河南省淅川县搬迁安置农村移民16.2万人，按要求两年内完成移民安置，搬迁强度前所未有。

移民工作难，难在故土别离、亲情割舍，难在安置对接、搬迁组织。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数以万计的基层干部长期深入搬迁第一线开展工作，说服动员组织百姓搬迁，保证移民安置工作顺利完成。“短短两年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搬迁安置工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作保证，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这在世界移民安置史上都是个奇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黄一兵说。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四年任务，两年完成”，不仅是我国水库移民迁安史上的创新，也是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宝贵财富。

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世界桥梁看中国”的底气辽阔的海面，港珠澳大桥这条蜿蜒的钢铁巨龙盘桓其上。这项“超级工程”，是目前全球总体跨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国际公认的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凡举“超级工程”，其建设必将面临一系列难题。港珠澳大桥由桥梁、人工岛、隧道三部分组成。为使大桥通过伶仃洋海面，需要筑起两座面积各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以及一条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实现桥梁与隧道的转换，惟有这种“桥—隧—桥”的组合，才能越过55公里的跨度。这也是大桥建设技术最复杂，建设难度最大的部分，极具挑战性。

据人民日报报道，经过反复研究实验，中国交建的项目人员采用“半刚性”沉管新结构，依靠先进的技术及高超的施工工艺，最终将每节近8万吨的33节沉管依次安放至几十米的海底，实现了“无缝对接”。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让“无缝对接”成为全球首创的结构

设计，也让港珠澳大桥拥有了世界首条“滴水不漏”的海底隧道。

联通三地，一望无际的碧海变通途。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这项被外媒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超级工程，拥有400多项专利、6项世界之最，先后投资超过1000亿，堪称我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里程碑之作。

今年6月，在第36届国际桥梁大会上，我国的合江长江一桥和泸定大渡河大桥，分别摘得有“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乔治·理查德森奖”和“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两项大奖。“此次中国两座桥梁囊括国际桥梁大会两项大奖，标志着国际桥梁界对中国桥梁工程自主创新的最典型代表——钢管混凝土拱桥的认可。”主持设计合江长江一桥的四川公路设计院总工程师牟廷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桥梁建设条件复杂，面临着资金短缺、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这逼迫我们必须进行技术革新。”

短短几十年间，中国路、中国桥飞速发展，交通网络连起大江南北，条条道路通进千家万户。截至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倍，年均增长6.1%；铁路营业里程则达到13.2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同时，我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

杭州湾跨海大桥、四川干海子特大桥、沪通长江大桥、金安金沙江特大桥……一座座世界级桥梁迎来“世界桥梁看中国”的称赞；从青藏公路、四川雅西高速公路，到沪昆高铁、广深港高铁，中国路、中国桥、中国车将这片广袤大地联系得更为紧密。

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建设超级工程的底气；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是建设超级工程的动力。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2010年达到41万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1951年至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人均国民总收入达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科技研发投入也在迅速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为1118亿元，是1995年的62倍，1996—2018年年均

增长 19.6%。中国科技实力也实现了从难以望其项背到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创造出越来越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70 年来，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成为工程建设的强大后盾，未来，随着经济与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惠及民生、展现国家实力的超级工程，也将不断涌现。

自主创新和工匠精神：“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超级工程究竟超级在何处？不单是指它的体量大、功能强，更是因为它背后所包含的“中国创造”“中国标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70 年来，高技术领域捷报频传、超级工程建设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广大科研人员的超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执着的工匠精神。

谈到“创新”二字，中国通号总工程师张志辉感受颇深，他认为，“整个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也是买不来的，必须有一批心无旁骛的人静下心来攻关钻研，才能取得真正控制技术的突破。”

港口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全球吞吐量排名前十的超级大港，中国已经包揽了七席。人称“无人码头”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化码头，目前共有 16 台双小车桥吊、88 台轨道吊和 80 台自动导引车，实现了集装箱装卸、水平运输、堆场装卸全程智能化操作。车来车往、忙碌异常的码头，人影却看不到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的生产操作系统全部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控制着码头上所有的自动化设备。上港集团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TOS 系统）和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系统（ECS 系统），两者组成了这个全新码头的“大脑”与“神经”。“中国芯”的创新、研制与应用，让国内这类全自动化码头的工程真正走在世界前沿。

陆地之上，须臾相接，全都倚靠坚持创新的科研人员与严谨不怠的大国工匠；同样，人们对于海洋的探索也从未停止。2012 年 6 月，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 7062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

录，同样打破了世界下潜深度纪录。“蛟龙号”十年研制过程中，总设计师、中船重工七〇二所研究员徐芑南院士带领团队破解了载人潜水器整体抗压、坐底方法、下潜上浮流程、应急技术等一个个关键难点，不断刷新中国人在大洋上的深潜新纪录。“蛟龙号实现了我国载人深潜技术领域从跟跑向领跑的重大跨越，推动了我国深海技术、装备产业和应用体系的跨越发展，为维护我国在国际深海大洋的权益及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徐芑南说。

明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全面建成并提供全球服务，它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国之重器，北斗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广大科研人员刻苦攻关，不断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关键技术上始终占有主动权。“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累计总量（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已突破 6 万件，位于全球首位，形成了新体制和新标准，引领了全球位置服务产业新发展。”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北斗重大专项专家邓中亮介绍。

70 年来，从缺资金建不起、没技术造不出，到如今接连建成“超级工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双手、用智慧、用毅力、用决心，创造出了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奇迹。中国以制度优势为保障、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作支撑、自主创新和工匠精神为牵引，托举起众多世界顶尖的“超级工程”，让百姓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路、中国桥、中国车、中国港，这些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超级工程，彰显的是中国精度、中国长度、中国高度和中国速度，令国人骄傲，让世界惊艳。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结晶。

（2019-09-26 人民网）



阅兵地点 为什么选在天安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9月27日，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

当天晚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经电台播出，北京城鞭炮齐鸣，热烈庆贺。首都初诞，大国新生，最隆重的庆贺当然还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周恩来提笔写下：“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早在1949年7月底，中共中央就确定，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为此，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成立后，很快拿出了典礼初步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三项内容里，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在什么地方举行，成了最让筹委会费脑筋的问题。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阅兵方案，分别选了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作为阅兵地点。两套方案各有利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天安门城楼作为现成的阅兵台。此外，天安门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群众结合很好，场面雄壮热烈，庆祝意义及影响大；周围的道路四通八达，部队便于集中，阅兵后部队由东向西，继可向南向西迅速离开市区。弊端也很明显，那时的长安街没有如今这么宽阔，不能按照正规阅兵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八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部队两路纵队，而且，阅兵当天，附近的交通需要阻断4小时。

西苑机场恰恰相反，距市区远，跑道宽敞，四周开阔，1949年3月毛泽东进驻北平后举行的第一次阅兵就在这里。有过一次阅兵经验，且受地形限制较小可进行正规

检阅及分列式，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不影响市内交通，却增加了数十万群众从市区到典礼现场往返的难度，部队集中过来路程也远。除此之外，西苑机场还有个最大的缺陷——没有阅兵台。

据档案记载，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共622人，如果在西苑机场临时搭建足以容纳600多人、且与天安门城楼同样气势恢弘的看台，显然时间来不及，花费也过大。正因如此，经过反复研究、论证，8月17日，华北军区还是把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17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复权衡比较后的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圆圈。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后，便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新中国第一根旗杆：自来水管焊接成的

阅兵地点确定后，北平市政府动员全市人民的新一轮大清理工作开始了。其实，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市就展开了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毕竟，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北平垃圾遍地，着实有损古都的形象，也不利于百姓的健康。

新一轮的大清理工作重心是天安门广场，具体工作由市建设局承担。市建设局接受任务后，确定了修整方案。9月10日，全市多所大学、中学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以及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等6000多人，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用双手搬开阻碍交通的石块，填平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天安门广场迅速变了模样。

紧接着，市建设局的500多名技术干部、工人，带着施工机械来到了广场。他们分头行动，加班加点推进每一项工作：清理城楼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补剥

落的墙面和地面，整修破败的门窗和廊柱，修葺金水桥，对金水河进行清淤，再注入清水，种植花草树木……其中，建设局技术负责人林治远负责的国旗旗杆设计和安装，可谓是重点任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升起，更是不容半点疏忽。按照整体设计要求，位于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中轴线上的旗杆高度应与城楼同等高。林治远经过实地测量，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如果以今天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为基础，制作一根35米高的旗杆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当年的林治远面对的是一个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北平城，别说制造旗杆，就连找到合适的原材料都绝非易事。

林治远四处奔波打听，终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按照粗细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没想到，焊完之后连同旗杆底座的总高度也只有22.5米，距离35米的高度还差不少。这可把林治远急坏了，原来，当年的北平工业技术有限，同样粗细的管子是无法焊接的，只能把不同直径的管子焊接在一起，偏偏自来水公司只有四种直径的水管，再多一根不同直径的都找不到了。

无奈，林治远只好把情况汇报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研究，又征求了各方意见，才确定国旗旗杆按22.5米的高度设计。就这样，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新中国第一根旗杆竖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上，直到1991年，这根旗杆被总长32.6米的新旗杆替代。

布置天安门城楼：8个大型红宫灯来自扎灯老艺人几乎与北平市建设局接到整修天安门广场的任务同时，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张致祥担起了另一项重任——布置天安门城楼。接到开国大典筹委会下达的“作战令”时，距离10月1日只剩下20多天，张致祥立刻马不停蹄地奔向天安门城楼查看情形。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天安门城楼的破败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墙皮翻卷，砖瓦剥蚀，墙头长着随风摇摆的野草，地上铺着厚厚的鸽粪“地毯”，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

张致祥找到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也就是2009年著名导演叶大鹰执导的电影《天安门》中舞美队长田震英的原型。之后，舞美队迅速分头忙活了起来，绘制毛主席画像、书写巨型标语、制作红旗……

其中最难的，要数8盏红色宫灯的制作。舞美队长苏凡原打算购买灯笼，没想到跑遍了北平城，也没找到那么大的宫灯。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苏凡着急得直上火，还是小野泽问了一句，北平城过去不经常制作宫灯吗？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



临时观礼台

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急奔故宫，检索了清宫档案，终于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应该七十出头。张致祥和苏凡果真找到了这位老艺人尹师傅。尹师傅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大胆豪放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几圈，提出：“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得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否则做成了也抬不上去。”就这样，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住在了天安门城楼上。9月30日，8盏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红宫灯终于制作成功。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十几名战士几经周折，才把宫灯安全悬挂在设计指定的位置上。

开国大典

10月1日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接着，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洪亮的宣告声久久回荡在天安门上空，礼炮齐鸣中，一个焕然一新、宏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华丽亮相。

(2019-09-29 北京日报)